

国外政治经济学最新研究述论(2024)

李连波^{1,2}, 汪根松¹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24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摘要:2024 年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以下八个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方面,对逻辑与历史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以及马克思早期与后期著作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探讨;在价值理论研究方面,围绕劳动强度、价值规律、价值形式、非生产性劳动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在剥削理论研究方面,对超级剥削、债务剥削、工作时间等问题,以及具体行业的剥削现象进行了分析;在资本积累理论研究方面,对让渡利润、利润率测算、原始积累过程、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数字技术对资本积累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在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进行了梳理与扩展,揭示了数字平台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货币、生息资本和金融资本理论以及金融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表现和应对方案进行了探讨;在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方面,对西方左翼学者否定帝国主义理论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围绕帝国主义的概念与理论展开了讨论。2024 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依然围绕资本积累与劳动剥削这两条主线,更加侧重基础理论研究,并从多角度、跨学科的视角出发,对相关现实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金融化;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F091.91;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25)06-063-18

本文从八个方面系统梳理了 2024 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并对 2024 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整体特点进行了简要总结。文献来源与前几年相比,在文献选取标准方面更加聚焦政治经济学,基于此,部分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献未被纳入。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扬尼斯·尼诺斯(Giannis Ninos)围绕《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循环的分析,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逻辑与历史的关系”问题。^[1]尼诺斯批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将逻辑与历史对立或简单等同的两种倾向,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是辩证的,既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特征,又隐含着其历史发展过程。尼诺斯通过对资本循环的三个公式的详细分析,揭示了资本循环的逻辑结构与历史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资本循环的逻辑序列既反映出资本主义的共时结构,又隐含着从

收稿日期:2025-03-17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ZKJC240605)

作者简介:李连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汪根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原始积累到成熟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尼诺斯指出,货币资本循环的第一阶段包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个阶段,购买生产资料的行为先于购买劳动力,这是资本关系在历史上产生的必要条件;在生产资本循环中,流通不再是资本产生的条件,生产资本循环体现了资本的积累机制,隐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商品资本循环揭示了资本循环的总体性和不同资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其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存在为前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阶段相对应。尼诺斯认为,马克思对资本循环的辩证分析描绘了资本的自我运动,在逻辑方法占主导地位框架内以扬弃的形式再现了其更广泛的历史发展过程。

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拉朱·达斯(Raju J. Das)认为,目前学界对于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机制缺乏深入探究,需要重新解释束缚的内涵,并进一步拓展其应用范围。^[2] 达斯对现有的解释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指出这些解释倾向于将束缚一词过度泛化,试图将资本主义产生的所有问题都纳入其中。柯亨(Cohen)等学者将束缚分为“发展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超出生产关系可以容纳的限度)和“使用束缚”(生产关系阻碍对现有生产资源的合理使用)等不同形式,达斯认为这种划分割裂了生产力发展与使用的内在联系,而且没有给予最重要的生产力即直接生产者应有的重视。达斯提出了一种综合性的分析视角,强调进一步扩展生产力的概念,将自然和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能力也包含在内。达斯认为,自然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力要素,需要不断改善,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了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同时,直接生产者的基本需求必须得到满足,才能使其拥有并发挥生产能力,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恶化,进而限制了其生产能力的发展。达斯还探讨了帝国主义背景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强调帝国主义剥削通过资源转移和经济政策影响南方国家的生产力发展。达斯指出,当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作用已经超过了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实现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考林(Mark Cowling)围绕马克思早期与后期著作之间是否具有“连续性”的争论,聚焦“异化”概念的理论地位,系统梳理了论战双方的主要观点并论证了“非连续性”观点的合理性。^[3] 考林指出,支持“连续性”的学者将异化视为连接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核心线索,认为其以“商品拜物教”“死劳动支配活劳动”等形式隐含于《资本论》等后期著作;而支持“非连续性”的学者则强调马克思在1845年后发生了“认识论断裂”,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考林从多个方面对“连续性”观点进行了批评,针对一些学者通过罗列马克思后期著作中异化出现的段落进行论证的做法,考林认为他们脱离了对具体语境的分析,马克思后期著作中出现的异化与早期著作存在差异;“概念等同论”(认为异化与剥削等概念等同)与实际不符,现实中存在高剥削、低异化的情况;认为马克思终生是黑格尔主义者的观点忽视了马克思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马克思后期著作中许多涉及异化的段落实际上与早期的异化理论存在差异,等等。考林强调,尽管马克思后期著作中偶尔也会出现异化一词,但其理论框架已经从人本主义异化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结构的科学分析,异化概念被剩余价值、商品拜物教等范畴取代,“连续性”论者忽视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哲学人本主义的超越。

二、价值理论研究

迪潘卡尔·巴苏、卡梅伦·哈斯和塔诺斯·莫赖蒂斯(Deepankar Basu, Cameron Haas & Thanos Moraitis)研究了劳动强度提高对剥削率及剩余价值形式的影响,并通过将劳动强度参数纳入单部门与两部门线性生产模型,系统分析了其理论机制。^[4] 他们首先定义了劳动强度提高所产生的双重效应:提高劳

动在单位时间内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能力(CPIO),其倾向于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效果类似;提高劳动在单位时间内创造价值的能力(CCV),其倾向于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工作日延长的效果类似。模型分析表明,劳动强度提高必然导致剥削率上升,因而始终有利于资本家阶级;剩余价值的形式取决于CPIO与CCV的相对大小,如果 $CPIO = CCV$ 或 $CPIO < CCV$,那么劳动强度的提高只产生了绝对剩余价值;如果 $CPIO > CCV$,那么劳动强度的提高同时产生了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但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出现;在两部门模型中,部门I劳动强度提高时,部门I的剥削率必然上升,部门II的剥削率变化取决于CPIO和CCV的相对大小,在长期中,阶级斗争和劳动力流动可能会使各部门的劳动强度趋于一致。几位学者指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在当代资本主义并未消失,而是以劳动强度提高的形式持续存在,资本在法定工作日的限制下采取了“隐形剥削”的形式。

英格丽德·哈农(Ingrid Hanon)对自主论(autonomist)马克思主义者的“价值规律危机论”进行了分析与批判。^[5]哈农指出,自主论者的观点源于对马克思“机器论片段”的错误解读,他们认为,随着马克思所说的“一般智力”的发展,传统以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机制会失效,导致价值规律陷入危机。自主论者强调非物质劳动的崛起,认为知识、创意和情感劳动等非物质活动成为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这些劳动的不可测量性使得资本难以按照传统方式衡量价值。哈农指出,自主论者混淆了价值与财富的区别,他们将“一般智力”等同于价值创造主体,错误地将科学技术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等同于价值创造能力。哈农批判了自主论者对马克思生产劳动概念的误读,指出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与劳动的具体内容或商品的物质性无关,而是基于劳动的社会形式。哈农指出,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只不过是资本通过技术重组强化劳动剥削的新策略,但自主论者将其视为价值规律陷入危机的证据。自主论者的理论弱化了价值理论对当代劳动转型的解释力,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则通过揭示抽象劳动的社会形式与剥削的隐蔽机制,仍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矛盾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批判框架。

长谷清(Kiyoshi Nagatani)基于宇野弘藏(Uno Kozo)的理论,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价值形式和商品拜物教理论进行了“重新审视”与“批判性分析”。^[6]长谷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商品价值定义为抽象劳动对象化的做法存在逻辑问题,商品的价值最初是在商品世界而非生产过程中确定的。长谷清分析了商品交换的特殊性,指出直接的商品交换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商品所有者的需求各不相同;商品交换分为主观交换和客观交换这两个阶段。长谷清认为,在简单价值形式中,马克思未能充分解释商品所有者如何通过交换关系赋予商品价值,商品的价值来源于商品所有者的交换意图,而不是抽象劳动;在扩大的价值形式中,商品所有者会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交换比例,因此商品在不同交换等式中的数量会有所不同;马克思通过将扩大的价值形式倒过来得到一般价值形式,但价值形式的两极具有不可逆性;货币形式的出现并不是商品交换的自然产物,而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货币的价值来源于其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长谷清认为,商品拜物教并非源于抽象劳动,而是源于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特定交换关系,价值形式理论和商品拜物教理论应当被整合为一个辩证的整体,这样不仅能揭示商品拜物教的本质,还能为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提供新的视角。

克莱尔·昆汀(Claire Quentin)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分进行了重新阐释,并分析了“微笑曲线”对于全球价值链分析的意义。^[7]昆汀指出,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分析往往将增加值视为衡量各环节对最终产品市场价值贡献的指标。然而,这种分析掩盖了价值捕获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区别。昆汀重新定义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认为只有直接参与物质生产的劳动才是生产性的;诸如设计、营销和品牌管理等其他形式的劳动,虽然对利润的创造有贡献,但并不创造价值,而是通过无形资产捕获价值。昆汀提出了一个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方法:劳动作为投入品是否得到了报酬;在交易进行时劳动是否提供了产出,这种产出可以是物质商品,也可以是消费

与生产同步进行的服务;这种劳动重组产生的物质是否超过了它消耗的物质。昆汀认为,价值创造仅发生于“微笑曲线”底部的物质生产活动,而两侧的研发、设计与营销、销售等并不创造价值。在全球价值链中,南方国家承担了低附加值的物质生产,北方国家则通过控制研发与品牌获取超额利润,从而使全球财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剧。

路易斯·阿尔博莱达斯—莱里达(Luis Arboledas - L rida)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研究影响力”指标(如引用量、期刊影响因子)的社会构建过程,及其在资本向学术领域扩张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8]阿尔博莱达斯—莱里达指出,现有文献虽然关注学术研究中的指标化现象,但未能深入解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阿尔博莱达斯—莱里达指出,研究影响力指标实质上是学术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指数,其通过连接学术研究的社会生产(论文产量)与社会消费(引用量),验证既定学术劳动是否产生了使用价值并且是否在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与劳动强度下进行。阿尔博莱达斯—莱里达认为,指标化的兴起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学术研究领域的扩张;学术劳动以私人化和独立化的形式展开,导致生产与消费脱节,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之间的协调只能通过研究影响力指标这种间接手段来实现。然而,学术界仍保留了部分直接生产关系(direc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如同行评议,这表明资本尚未完全统治学术领域。因此,指标既是资本主义支配学术劳动的工具,也反映了学术界在资本渗透下的矛盾状态——既依赖指标实现间接协调,又部分保留了传统的直接生产关系。

克莱门·克内兹(Klemen Knez)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持续存在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进行了分析。^[9]克内兹指出,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理论无法直接应用于全球范围,尤其是在国际分工不均衡且采取专业化形式的情况下。为解决这一问题,克内兹提出“广义全球价值规律”概念,并引入“国家抽象劳动时间”这一新的概念,强调劳动首先在一个国家市场中转化为国家抽象劳动,然后再进入全球市场。克内兹进一步探讨了国际价值增殖中的分配问题,特别是剩余价值率的国别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国家的剩余价值率都接近 100% 且在长期内保持稳定,与各国生产率的差异并无显著联系。这个结果与传统的基于剥削率差异解释不平衡发展的观点相矛盾。克内兹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模式不仅加剧了不平衡发展,还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因为发达国家能够进一步释放劳动力用于更先进的生产活动,发展中国家则被锁定在劳动密集型生产中。克内兹认为,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内部机制的结果,而非简单的价值转移或不平等交换的产物。

三、剥削理论研究

托尼·伯恩斯(Tony Burns)重新梳理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剥削理论,并分析了当前流行的“超级剥削”概念的理论缺陷。^[10]伯恩斯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剩余价值的五种榨取方式:延长工作日时长、提高生产率、生产过程的高效组织、增加劳动强度以及压低劳动者的消费。伯恩斯逐一分析了这五种方式在不同情形下对剥削的影响。伯恩斯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通过综合使用多种剥削方式来维持利润,而非依赖单一手段。伯恩斯认为鲁伊·莫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等学者提出的“超级剥削”概念在理论层面仅关注压低劳动者消费这一个方面,忽视了马克思剥削理论中其他重要的剩余价值榨取方式;“超级剥削”概念也忽视了北方国家同样存在的劳动者消费被压低的现象(如“不稳定无产者”的存在),并低估了管理创新在南方和北方国家剥削中的普遍性。

贡萨洛·杜兰和迈克尔·斯坦顿(Gonzalo Dur n & Michael Stanton)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分析了智利缩短工作时间对经济、劳动关系及工人阶级组织力量的影响。^[11]杜兰和斯坦顿指出,尽管缩短工作时间可能直接减少剩余劳动时间,但资本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增强劳动灵活性以及提高固定资本使用效率等

手段,提升单位时间内的劳动量,以维持甚至提高剩余价值率。杜兰和斯坦顿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构建了几何模型,用图形方式展现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等变量的关系,并用智利 2014 年至 2018 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2014~2018 年,智利的每周工作时间从 45 小时缩短至 40 小时,其生产率提高了近 50%,实际工资增长了近三分之一,但剩余价值率从 93% 飙升至 140%,资本攫取了 62% 的新增价值;劳动强度提高所产生的收益并未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平均分配,尽管工人的工资上涨了,贫困水平也出现下降,但资本获取了大部分好处。杜兰和斯坦顿进一步分析了智利 2023 年颁布的法律的具体条款,如灵活调整工作时间(一个月内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0 小时即可),可与工会协商将每周工作时间延长到 52 小时,加班时间可用于兑换带薪假,等等。杜兰和斯坦顿指出,这些规定赋予资本更大的灵活性,使其能够消除“无效时间”并加快生产节奏,实际上在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表象下实现了劳动强度的提高。

尼克·伯恩斯(Nick Burns)研究了美国社会中的学生债务问题,探讨了其现状、历史发展、社会影响及引发的争议。^[12]美国学生债务的规模极其庞大,总额达 1.7 万亿美元,高于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债务,三分之二的美国本科生需要借钱来支付学费,其中低收入群体的债务负担最重。伯恩斯认为,学生债务不仅是个人的经济负担,更是影响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与分裂,对美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伯恩斯回顾了美国学生金融体系的历史起源与发展脉络,描述了学贷美(Sallie Mae)等金融机构在学生债务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影响,深入分析了美国学生债务问题对社会阶层、教育机会、经济稳定以及政治格局等多个方面的影响。伯恩斯指出,美国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进入四年制大学的比例远低于高收入家庭,这表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学生债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学生债务还对个人的经济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如推迟结婚、无法购房等,限制了个人的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学生债务问题也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不同政治派别对学生债务减免持不同立场,反映了美国社会在教育体系、经济政策等方面存在的深刻矛盾。

大卫·斯宾塞(David A. Spencer)比较了马克思和凯恩斯对未来工作时间的展望及其当代相关性。^[13]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出发,指出阶级斗争是缩短工作时间的关键;凯恩斯则基于宏观经济调控,预言技术进步可以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逐步减少工作时间,最终达到每周 15 小时工作制。斯宾塞认为,尽管马克思和凯恩斯在分析方法和政治立场上有显著差异,但他们在减少工作时间方面有以下共同之处:他们都认为应该减少工作时间,增加闲暇时间;他们支持减少工作时间的原因在于对(资本主义下的)工作持负面态度;两人都强调了将时间花在工作之外所带来的收益,鼓励人们参与各种创造性活动;他们都强调了技术在减轻工作负担方面的作用;两人都关注阻碍工人缩短工作时间的权力来源;他们都提供了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经济思想。斯宾塞指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工作时长基本没有发生变化,甚至因女性劳动力参与和消费主义的兴起而出现增长,主要原因包括工人谈判能力被削弱、政策放弃充分就业目标及技术未服务于工作时间缩减。斯宾塞强调,当前需要通过系统性的改革缩短工作时间,通过平衡技术进步与权力分配实现更人性化的工作与生活,而非单纯追求效率或增长。

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奢侈品牌通过推出低价产品向中低阶层渗透,形成了所谓的“奢侈品民主化”。马尔科·拉赫和安德烈·苏什扬(Marko Lah & Andrej Sušjan)从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角度对大众奢侈品现象进行了分析。^[14]拉赫和苏什扬认为,现代大众奢侈品既需要大规模生产以实现利润,又需要维持“稀缺性”幻觉以巩固品牌权力,二者之间存在矛盾。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品牌拜物教”掩盖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大众奢侈品通过创造新的需求延缓了利润率下降趋势,并通过制造“阶级相似性幻觉”发挥了稳定阶级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制度经济学从凡勃

伦的“炫耀性消费”概念与加尔布雷斯的“企业操控需求”理论的角度,揭示了品牌如何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以及企业怎样通过广告、明星代言和限量营销塑造消费者欲望。后凯恩斯主义则从企业定价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指出寡头企业采用成本加成定价将高固定成本转化为品牌溢价,并通过跨市场补贴和销毁滞销商品维持稀缺性。拉赫和苏什扬指出,“奢侈品民主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企业通过品牌叙事操控需求、获取高额利润并维持社会稳定的策略,消费者行为受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双重驱动,其进一步暴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异化本质。

西格德·诺德利·奥佩加德(Sigurd M Nordli Oppegaard)基于马克思的劳动“形式从属”与“实际从属”理论,分析了挪威奥斯陆出租车行业的平台化现象及其对司机工作条件的影响。^[15]奥佩加德认为,出租车行业中的劳动与资本属于形式从属关系,出租车平台虽然引入了新的细分市场和数字技术控制,但尚未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实际从属。研究发现,出租车平台通过算法分配订单、动态定价和评分系统间接控制司机收入,但司机的劳动过程与传统模式并无差异——司机仍需长时间工作,依赖计件工资,而且司机的工作具有较高自主性;平台的奖励机制能够激励司机增加工作时间,但并未直接干预司机的驾驶行为,评分系统的存在并未对司机的行为造成明显约束。奥佩加德指出,平台“算法管理”的核心功能是管理市场关系,而非控制劳动过程。奥佩加德批评现有研究往往高估了平台技术的变革性,他强调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分析其影响,避免技术决定论。奥佩加德指出,挪威的案例表明,平台化更多体现的是资本通过数字工具加强对劳动的控制,而非彻底重组劳动过程,尽管平台化将来可能导致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但目前仍需对平台控制劳动过程所产生的后果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学术出版业的资本积累问题进行了分析。路易斯·阿尔博莱达斯—莱里达(Luis Arboledas—Lérida)对“同行评审无偿劳动论”进行了批评。^[16]“同行评审无偿劳动论”认为,商业出版商所取得的高额利润来自对学者无偿劳动的剥削。阿尔博莱达斯—莱里达认为该观点的两大核心论点——同行评审完全无偿与同行评审是主要利润来源——均存在根本性的理论错误。首先,同行评审是有报酬的,即使这种劳动的剥削率很高,也不能将之归入无偿劳动。其次,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学术出版领域的资本是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其利润主要来自全社会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同行评审的贡献微乎其微。为深入揭示同行评审的实质,阿尔博莱达斯—莱里达借鉴了《资本论》第二卷对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的区分,认为同行评审作为稿件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类似于葡萄酒发酵中的自然力作用时间,属于生产时间中的劳动中断期;资本在此期间停止增殖,出版商仍需投入基础设施,因而产生了额外成本;由于同行评审具有自愿性和不可控性,因而出版商的资本周转与价值增殖有陷入停滞的风险。阿尔博莱达斯—莱里达呼吁回归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清学术出版商真正的利润来源,在此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策略,反抗当前的资本主义学术出版体制。

四、资本积累理论研究

阿尔珀·杜曼和艾哈迈德·托纳克(Alper Duman & Ahmet Tonak)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中让渡利润(profit on alienation)的概念及其作用,并对土耳其房地产和金融部门的让渡利润进行了测算。^[17]杜曼和托纳克区分了“生产性利润”(剩余价值)与“非生产性利润”(让渡利润),认为剩余价值源于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剥削,让渡利润则通过非生产性交易(如公共土地私有化和金融信贷)实现价值转移,其本质是通过权力不对等交易(如垄断地租、债务契约)实现的财富再分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10~2021年,土耳其房地产部门的让渡利润总额为93.1亿美元,金融部门的让渡利润总额达到了惊人的572.3亿美元,这两个部门的让渡利润总额占企业利润总额的9.23%,这几个数字都不容小觑。杜曼和托纳克指

出,虽然新兴经济体和欠发达国家更容易产生高额的让渡利润,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公共土地私有化和债务驱动的消费主义,因而让渡利润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应当将让渡利润作为独立的分析范畴,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积累理论。

卡洛斯·加西亚(Carlos A. D. Garcia)通过分析哥伦比亚最大的4963家公司的财务数据,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利润率在公司和行业间的分布特征。^[18]加西亚采用了非参数估计方法中的核密度估计方法,将利润率定义为税后利润与总资产的比率。此外,加西亚还计算了简单算术平均利润率和加权平均利润率,以分析行业内部的异质性和资本集中情况。实证结果表明:各企业的利润率存在显著的差异,呈非正态单峰帐篷形分布,简单算术平均利润率高于中位数利润率,说明大多数公司的利润率低于平均水平,只有少数公司的利润率较高;有相当比例的公司出现亏损,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资本积累与增殖动态的分析一致;行业层面的平均利润率也存在较大差异,从-2.3%到9.5%不等,而且没有出现严格的短期利润率平均化现象,这表明不同行业的利润率受多种因素影响;从利润率的行业分布来看,大多数行业呈现类似的单峰帐篷形分布,但矿业、金融和媒体行业的分布形态有显著差异,其原因在于部分公司通过采用新技术和更有效的劳动组织实现了较低的单位成本和较高的利润率。

卡洛斯·伊瓦拉(Carlos A. Ibarra)分析了墨西哥经济中利润份额上升与资本积累率长期停滞之间的结构性矛盾。^[19]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前10年末,墨西哥私营企业部门的利润份额从57%上升到67%,但资本积累率却始终维持在3.5%左右的低位。通过剑桥积累方程和韦斯科普夫利润率分解框架,伊瓦拉指出这种脱节源于两方面:一是产出/资本比率下降导致利润份额的上升未能与利润率的提高相对应(直接效应弱化),二是利润中的投资份额未随利润增长而提高(间接效应缺失)。在制造业领域,这种脱节尤为显著。计量经济分析表明,墨西哥的资本积累率不仅受国内产出/资本比率下降拖累,还受墨西哥与美国制造业相对利润率的持续下滑(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2.84降至21世纪前10年末的2.29)拖累,因为在产业高度一体化和资本流动性较强的情况下,墨西哥企业的投资决策既取决于国内利润率,也取决于国内利润率与国外利润率的相对变化情况。此外,金融化指标显示,净利息支付占利润的比例从5.5%提高到7.2%,其通过挤压投资份额(估计导致投资份额下降约3.6个百分点)进一步削弱了资本积累。

奇汉·西内姆雷(Cihan Cinemre)分析了土耳其的财政政策所驱动的原始积累过程及其对社会各阶级的影响。^[20]西内姆雷指出,马克思所阐述的原始积累过程在当代土耳其仍存在,“财政剥夺”(fiscal expropriation)构成了土耳其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导致了普通民众的贫困和社会财富向大资本的集中。西内姆雷认为,土耳其的财政剥夺是国家强制力与资本积累相结合的产物,其内容涵盖税收、国债、公共采购制度以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等。土耳其的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如对进口的依赖和经常账户赤字,这使得原始积累成为资产阶级的必然选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埃尔多安政府利用危机进一步推动了私有化、税收改革和公共采购制度改革。西内姆雷指出,土耳其的净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从2017年的7.5%上升到2022年的22.2%,政府债务产生的利息支出也迅速增加。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政府进一步提高了税率,主要针对中小资产阶级和工薪劳动者;土耳其的公共采购法律经历了多次修订,公共采购缺乏竞争和透明度,例外条款的存在与协商程序的滥用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土耳其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存在高成本和低效率的问题,对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资产阶级则获得了稳定的利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认为,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托马斯·皮凯蒂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的努力注定会失败,因为他们忽视了制度的异质性及其动态变化。埃米利亚诺·布兰卡

乔和法比安娜·克里斯托法罗 (Emiliano Brancaccio & Fabiana De Cristofaro) 批评了阿西莫格鲁的观点, 他们认为阿西莫格鲁所说的制度的动态变化反而会进一步强化“一般规律”。^[21] 皮凯蒂通过长时段经验研究发现了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规律”。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 2015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宣称推翻了皮凯蒂所发现的“规律”, 并据此认为所有试图得出“资本主义一般规律”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布兰卡乔和克里斯托法罗对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与修正, 修正后的实证检验结果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为皮凯蒂所发现的“规律”提供了经验证据。布兰卡乔和克里斯托法罗认为, 皮凯蒂所发现的“规律”和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集中规律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资本集中比收入不平等更重要, 因为其涉及资本控制权的集中。布兰卡乔和克里斯托法罗通过对资本集中度的实证分析, 发现资本集中度与资本回报率和 GDP 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这支持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集中规律。阿西莫格鲁认为, 制度的异质性和动态变化意味着存在多种可能的制度和政策变化, 这些变化可以作为“反事实” (counterfactual) 来否定“一般规律”。布兰卡乔和克里斯托法罗对阿西莫格鲁的“反事实”认识论进行了批评, 认为“反事实”的存在并不必然否定“一般规律”, 因为制度动态变化也可能加强这些规律。

迈克尔·高尔 (Michael Gaul) 通过工资曲线 (wage curves) 这一工具, 从概念、理论和实证三个层面回应了对马克思技术进步理论的批评。^[22] 高尔指出, 马克思将技术进步定义为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即单位净产出所需的劳动总量减少, 这种技术进步的“弱定义”允许存在劳动节约型、资本使用型和混合型技术进步, 但马克思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通常表现为资本偏向型 (即“马克思偏向型技术进步”)。高尔选取了奥地利、德国、美国等 13 个国家 2000 ~ 2013 年的数据, 基于 OECD 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和 STAN 数据库, 构建了多部门投入产出模型, 分析了工资曲线的历史变化。研究发现, 各国总劳动生产率均保持上升, 从而验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生驱动技术进步”的核心命题; 资本生产率的演变呈现出国别差异, 这一结果表明马克思偏向型技术进步并非唯一路径; 大多数国家的工资曲线都接近线性, 而且代表新技术与旧技术的工资曲线的交点位于实际利润率的右侧, 表明资本家更倾向于选择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高尔指出, 马克思的“弱定义”能够解释资本主义技术变革的核心机制, 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动态提供了有力工具, 但仍然需要纳入更广泛的社会与生态维度以进一步拓展其解释边界。

胡里奥·华托 (Julio Huato) 探讨了数字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本积累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以及社会主义者如何应对这一挑战。^[23] 华托认为, 数字技术革命不仅改变了生产的技术条件, 还加剧了阶级斗争, 成为资本积累、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工具; 数字技术本质上是劳动合作的高级形式, 但这种合作的成果被资本剥夺, 成为剥削工人的手段; 数字技术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但这种“劳动时间经济”的增长是有极限的, 受到资本积累和社会需求的限制。华托指出, 在阶级社会中, 任何强大的新技术的主要用途都是阶级斗争, 数字技术也不例外; 数字技术并未实现节约劳动时间并促进人类解放的目的, 反而成为资本主义实施阶级统治和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载体。华托批评了伴随数字技术革命产生的三种意识形态——去实体化技术 (disembodied technology)、技术决定论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和机器反叛 (rebellious machines) 恐惧。华托认为, 这些意识形态掩盖了技术的物质基础与阶级矛盾, 将社会问题归咎于技术本身而非生产关系。华托最后呼吁, 社会主义者应当打破技术异化, 通过民主化控制将技术重新定向为解放工具, 而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终结资本对技术的支配, 数字技术的未来取决于工人能否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构建以民主计划为基础的技术治理体系。

保罗·伯克特 (Paul Burkett) 探讨了音乐在人类发展和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作用。^[24] 伯克特认为, 音乐作为人类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 对于个人和集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资本主义推动了音乐的商品化, 音乐家的创作不得不迎合市场的需要, 从而限制和扭曲了人类的创造力;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 音乐为

人们的工作、交通、购物、娱乐等场所提供了背景音乐,这些音乐的选择是出于资本的需要,而不是人类发展的需求;我们需要通过全面的斗争来争取用音乐自主表达个人情感和政治情感的自由——在资本主义音乐的主导趋势中努力开辟新的表达形式,反抗资本将个人和集体自由表达自身的音乐作品商业化和异化的倾向,以创造性和反资本主义的方式改造现有的音乐形式。伯克特指出,一些自由的音乐表达方式(如自由爵士)能够帮助基层民众摆脱资本主义音乐和文化产业的控制,音乐技术的变化也为反抗资本主义音乐产业中的异化提供了基础——一些年轻音乐家能够利用计算机、数字化乐器和互联网创造性地表达和沟通情感。伯克特呼吁社会重新审视音乐的价值,将文化视为一种公共品,为音乐家和其他文化生产者提供收入保障与国家补贴。

五、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

马尼·霍尔博罗(Marnie Holborow)重新评估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性别理论中的地位,回应了学界对恩格斯的批评,并揭示了恩格斯的理论对分析当代性别压迫与家庭危机的现实意义。^[25]霍尔博罗指出,恩格斯受摩尔根《古代社会》启发,结合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提出了家庭形式和女性地位随生产方式演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恩格斯认为对女性的压迫是相对较新的现象,原始社会并不存在对女性的压迫,资本主义通过将家务劳动制度化为一种私人服务,进一步加剧了对女性的压迫,但女性参与社会化生产打破了传统性别分工以及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从而为女性的集体抗争创造了条件。霍尔博罗回应了女性主义者对恩格斯的批评,如过度依赖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在构建理论时过于侧重经济因素,存在性别偏见,等等。霍尔博罗指出,恩格斯虽然借用了摩尔根的许多术语,但其核心在于揭示家庭形式演变的物质基础。不可否认,恩格斯的语言受到当时关于性别角色的成见影响,但恩格斯显然认识到了性别角色是由社会构建的。霍尔博罗强调,恩格斯的分析为我们认识当代性别压迫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工具,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还为我们解决性别压迫问题提供了革命的政治视角。

亚历山德拉·皮莱蒂奇(Aleksandra Piletić)以阿姆斯特丹和柏林的食品配送、清洁和护理平台为例,研究了新自由主义下平台经济的发展对工资关系和社会再生产的影响。^[26]皮莱蒂奇认为,平台并没有完全颠覆现有制度,而是从内部改造了新自由主义,使其产生了“混合化”(hybridization)过程。根据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混合化”指的是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相互作用而发生转变的过程。皮莱蒂奇认为平台就引发了类似的“混合化”过程,这种混合化没有造成现有的社会妥协破裂,而是适应了现有的制度环境,从整体上维护了新自由主义积累模式。皮莱蒂奇聚焦“工资—劳动关系”这一制度形式,对调节学派的分析框架进行了扩展,将社会再生产维度纳入进来。皮莱蒂奇认为,平台融入了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发展动态:一是嵌入灵活且不稳定的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吸纳迫切需要工作的失业或就业不足的工人;二是回应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危机,提供了低成本的劳动力和服务,满足了因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而陷入困境的个人和家庭的再生产需要。皮莱蒂奇指出,平台经济是新自由主义的延续与局部重构,“平台资本主义”的提法过分夸大了平台的颠覆性作用,“混合化”概念则准确描述了二者的动态关系。

盖尔盖伊·塞尼(Gergely Csányi)重新审视了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的“家务劳动辩论”,指出其围绕“价值”与“身体和亲密关系”两大主题展开,但后者被长期忽视。^[27]塞尼认为,家庭是商品链的起点,家庭所创造的价值被“全球社会工厂”的诸多节点所榨取;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依赖廉价劳动力,家庭主妇是资本主义历史上一种处于从属地位的特殊廉价劳动力形式。女性身体在亲密关系、生育、抚养子女

以及性方面的能力被赋予了资本主义功能,亲密关系成为了生产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这种对女性的压迫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无法被任何其他结构性因素所替代。塞尼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将价值生产局限于工资劳动的做法,强调反资本主义运动需打破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等级划分”,承认家庭、非正式经济及边缘群体在价值创造中的核心地位,并揭示资本如何通过身体压迫将亲密关系转化为积累策略。塞尼呼吁将社会再生产分析从狭隘的经济范畴扩展到身体政治与全球不平等,认为反资本主义斗争必须同时挑战资本主义的价值榨取机制及其对人类关系的异化,尤其需要关注女性在资本主义中的结构性角色,以实现资本逻辑的全面颠覆。

贾斯敏·乔利—舒尔茨(Jasmine Chorley-Schulz)分析了工人阶级士兵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角色与地位。^[28]乔利—舒尔茨认为,士兵虽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因其依赖工资维生且士兵的劳动与工人的劳动一样被剥夺,因而应将其纳入工人阶级范畴,但军事劳动的特殊性(暴力实施)使士兵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士兵通过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乔利—舒尔茨认为,士兵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三种再生产职能。第一,士兵通过提供建设、工程、医疗、战斗和杀戮等各种具体活动,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功能,通过镇压性力量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并在全球范围内维持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第二,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士兵通过为家庭赚取工资维持士兵家庭的再生产。第三,士兵通过军营和家庭中的无偿劳动维持工人阶级自身的日常再生产。乔利—舒尔茨指出,历史上士兵既可能成为革命主体,也可能沦为反动工具,其政治立场取决于意识形态斗争与具体历史条件;士兵的角色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他们的存在凸显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法调和的矛盾。

六、货币金融理论与金融化研究

布鲁诺·赫菲格、莱昂纳多·帕斯·穆勒和伊德利·科隆比尼(Bruno Höfig, Leonardo Paes Müller & Iderley Colombini)从货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的二重功能——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出发,通过区分“作为货币的货币经营资本”(MMDC)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经营资本”(MCDC),发展了马克思的货币经营资本和生息资本概念,为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的不同角色及其演变提供了解释。^[29]赫菲格、穆勒和科隆比尼认为,生息资本并非指特定的资本形式,而是资本主义信用体系下所有资本的表现形式;银行与非银行机构的净收入采取了利润而非利息的形式,因而不能将它们归为生息资本,实际上它们分别属于MMDC和MCDC的形式。作为MMDC的银行通过管理货币的支付流通来降低社会流通成本,以提高平均利润率;作为MCDC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则通过配置储蓄资金参与资本增殖,推动资本市场的扩张。二者的分化源于资本主义降低流通成本、提高利润率的内在趋势。赫菲格、穆勒和科隆比尼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管理金融财富方面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银行,影子银行、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化现象迅猛发展,这一趋势源于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冲动。

比尔·邓恩(Bill Dunn)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深入探讨了货币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及其与价值、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30]邓恩提出了四个论点:第一,货币早于资本主义数千年就已存在,货币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衡量尺度经历了漫长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的货币化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进程。第二,即便从严格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来看,货币也不能完美地衡量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货币自身的价值受生产率变化影响,而且货币的不同职能之间存在冲突,货币的非消耗性也使其无法反映当前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三,作为世界货币的商品货币,只有通过国内和国际间的协调才能

发挥作用。货币的国际职能始终依赖国家权力,而非市场自发秩序。第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消除了所有客观的衡量标准,这使得如果不深入理解国家的作用及其货币政策,就无法理解价格与价格失调现象。美元取代黄金成为世界货币后,价值与价格的直接对应彻底消失,国家只能通过货币政策主动塑造货币价值。邓恩强调,当代的金融化发展并非国家失控的结果,而是国家与资本共谋的产物,国家通过救助银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延缓危机,但也为新一轮的金融不稳定与危机埋下了隐患。

米格尔·里韦拉(Miguel Rivera)等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中金融资本权力集团的形成及其经济与社会影响。^[31]里韦拉等指出,金融资本是摆脱了特定职能限制的大资本,能够在工业、金融和商业领域同时运作,其形成受到技术革命、信用过度膨胀以及资本再生产地理空间扩张等因素的推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国金融资本频繁采取高风险操作手段,并不断强化其垄断地位,致使危机爆发的频率与日俱增。里韦拉等认为,作为最后贷款人的美联储已经从经济稳定的守护者转变为金融资本权力集团的合作伙伴;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与量化宽松政策购买有毒资产,将危机成本转嫁给社会,成为权力集团的“最后投资者”。里韦拉等强调,当前金融资本权力集团通过数字平台和全球银行体系强化剥削与控制,这一权力集团的持续扩张可能将资本主义推向系统性崩溃,而中央银行的救市作用已经发挥到了极限,再无法掩盖资本过度积累、利润率下降和阶级对立的深层结构性困境。

佩德罗·罗梅罗·马克斯和费尔南多·鲁吉茨基(Pedro Romero Marques & Fernando Rugitsky)对2000~2019年间巴西经济中的食利者收入份额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了考察。^[32]马克斯和鲁吉茨基对功能性收入分配框架进行了扩展,将国民总收入划分为食利者收入、工资、企业利润和政府收入四部分,在食利者收入方面集中于金融掠夺(工人家庭的债务利息支付)的作用。研究发现,尽管食利者收入的份额总体保持稳定,但其内部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金融掠夺成为食利者收入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马克斯和鲁吉茨基将食利者收入分解为金融公司收入和家庭利息收入,研究发现,金融公司收入份额在2007~2012年间降低了一半,家庭利息收入份额不但并未下降,反而在2007~2011年间保持了增长;2012年后的政策干预(如压低利差)短暂压缩了食利者收入,但2015年实施的货币紧缩政策使食利者收入再次反弹。马克斯和鲁吉茨基指出,虽然工人阶级在劳动市场上获得的收入份额增加了,但他们通过利息支付将更多的收入转移给了食利者,导致修正后的工资份额在2004~2011年间几乎持续下降,企业利润份额也在此期间下降,政府收入份额则因政府债务利息支付减少而有所增加。马克斯和鲁吉茨基的研究强调了金融化对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所产生的深层影响,为理解巴西经济中的分配冲突提供了新的视角。

贾拉尔·卡纳斯和马尔科姆·索耶(Jalal Qanas & Malcolm Sawyer)考察了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六个成员国近三十年来的金融化发展历程。^[33]卡纳斯和索耶指出,GCC国家的金融化具有一定的独特性,GCC国家凭借石油财富建立了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其金融化过程也与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密切相关。卡纳斯和索耶分析了主权财富基金在GCC国家金融国际化中的关键作用。这些基金已成长为国际金融市场中举足轻重的参与者,它们凭借在全球范围布局投资,不仅促进了GCC国家的经济转型,还增强了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卡纳斯和索耶详细分析了伊斯兰金融在GCC国家的兴起及其对金融化的影响,伊斯兰金融禁止利息支付和纯货币投机,注重风险共担和实物资产投资,这使其与传统金融有本质区别。整体来看,GCC国家的金融化并未简单复制西方经验,而是通过主权财富基金的全球化资产配置,以及伊斯兰金融的本土创新,形成了一种混合型金融体系。卡纳斯和索耶指出,尽管GCC国家的金融体系在深度和复杂性方面仍与其他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但其通过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高风险资产和伊斯兰金融的国际化扩张,深刻影响了全球资本流动;GCC国家的金融化虽有独特优势,但也面临

诸多挑战,包括如何实现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平衡、伊斯兰金融与国际金融标准的融合等。

安德鲁·霍尔丹、亚历山德罗·米利亚瓦卡和维拉·帕莱亚(Andrew G. Haldane, Alessandro Miggia-
vacca & Vera Palea)分析了欧盟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对经济金融化和企业行为的影响。^[34]他们构建了一个基于标准投资模型的扩展模型,纳入影响企业投资的多种因素,包括企业投资机会、盈利能力、其他企业特征(如债务杠杆、财务支付、生命周期阶段、所有权结构)以及外部因素(如技术发展、行业法规、货币政策等)。霍尔丹、米利亚瓦卡和帕莱亚选取了欧盟 1990~2019 年间 5301 家非金融企业的数据进行研究,这些企业在 1990~2004 年间采用了国内一般公认会计原则(DGAAP),2005 年起被强制采用 IFRS。他们采用了多种投资衡量指标,包括资本支出(CAPEX)、资本支出加兼并收购(CAPEX + M&A)等,以全面反映企业的投资行为。描述性统计与计量分析表明,IFRS 企业的投资水平普遍低于 DGAAP 企业;无论是从资本支出还是更广泛的投资指标来看,IFRS 企业的投资敏感度都显著低于 DGAAP 企业;IFRS 实施后,企业的投资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投资水平下降,财务支出增加,尤其是股东分红与资本支出的比例显著上升,表明企业更倾向于将资源分配给股东,而非用于长期投资。霍尔丹、米利亚瓦卡和帕莱亚指出,IFRS 的实施确实促进了欧盟企业管理中的短期主义,降低了企业对实体经济的再投资;会计准则不仅是技术性规定,更是塑造经济和社会的有力工具,其制定应考虑公共政策目标。

佩林·阿克恰冈—纳林和阿德姆·亚武兹·埃尔韦伦(Pelin Akçagün - Narin & Adem Yavuz Elveren)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金融化与军事化之间相互强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35]阿克恰冈—纳林和埃尔韦伦指出,美元霸权确保了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化中心的霸权地位,这种经济权力使美国能够维持庞大的军事预算和遍布世界各地的数百个军事基地,这反过来又维护了美国的政治权力,从而确保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在实证分析方面,阿克恰冈—纳林和埃尔韦伦用军事支出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军事化程度,并采用了一系列金融化衡量指标。研究发现,不同的金融化衡量指标与军事化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比如军事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与净利息(或净股息)占 GDP 的比重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其与金融利润占非金融利润的比重之间存在二元因果(bivariate causality)关系;如何界定利润率以及是否将金融因素纳入进来对于研究结果至关重要;军事支出与一般利润率(即未修正的利润率)和金融利润率均呈正相关,而且军事支出与金融利润之间的相关性,比其与一般利润率之间的相关性更为显著。阿克恰冈—纳林和埃尔韦伦指出,金融化与军事化的复杂互动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金融化为美国军事支出提供了资金支持,军事力量则保障了美元霸权与金融资本扩张。

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于 2024 年出版了著作《生态辩证法:社会与自然》。在该书的引言中,福斯特分析了生态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探讨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路径。^[36]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揭示了人类劳动作为一种自然力与地球物质循环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资本主义通过异化劳动和对自然的掠夺产生了“物质变换裂缝”,表现为土壤肥力衰竭、森林退化等局部生态危机,并在人类世升级为地球系统层面的危机。福斯特批评了苏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辩证法的忽视,认为这种忽视导致了对生态危机的忽视。福斯特呼吁恢复和发展生态辩证法,他强调,生态辩证法不仅是一种理论工具,也是一种实践指南。福斯特分析了生态危机的全球性特征,指出当前的生态危机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生态危机的解决需要全球合作,通过社会革命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面对当前资本通过“自然金融化”(如碳交易)加速掠夺地球的趋势,福斯特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路径:以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为工具,联合全球工人阶级与环境社

群,推动“有计划的去增长”战略,打破资本无限积累逻辑,实现可持续的生态文明。

阿尔曼·斯佩斯(Arman Spéth)围绕“生态社会主义与去增长”主题对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进行了访谈,福斯特在访谈中详细阐述了他对去增长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这些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37]福斯特解释了“去增长”和“去积累”之间的联系,认为去增长是一个模糊的术语,真正关键的是零净资本形成,即去积累,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积累。福斯特详细阐述了“计划性去增长”的概念,认为去增长和可持续的人类发展都离不开规划,民主规划在社会各层面的实施是实现实质性平等、生态可持续和人类生存的唯一途径。福斯特回应了一些学者对去增长理论的批评,认为这些批评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狭隘理解,生产力的提高应当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即使在零净资本形成的背景下,也可以通过减少单位产出的劳动时间来提高效率,从而实现生产力的提高。福斯特强调,当今科学表明,如果不对社会经济制度、应用技术以及人类与地球的关系进行彻底变革,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气候变化、化学污染、塑料泛滥、水资源短缺、物种灭绝等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积累体系,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彻底摒弃资本积累逻辑。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榨取主义(extractivism)在人类世时代的发展及其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影响。^[38]福斯特指出,榨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和“大加速”时期;榨取主义不仅是对资源的过度开发,更是晚期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对地球系统的破坏性影响的体现。福斯特深入探讨了榨取主义的理论基础,特别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掠夺自然的分析。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对自然的掠夺,这种掠夺不仅包括对土地和身体的掠夺,还包括对地球本身的掠夺。福斯特介绍了乌拉圭生态批评家爱德华多·古德纳斯(Eduardo Gudynas)的榨取主义理论,认为其为理解榨取主义所产生的经济和生态损失提供了新的视角。福斯特还探讨了榨取主义与人类世危机之间的关系,认为当前的人类世危机与资本积累体系密切相关,当前社会斗争的首要任务是对抗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尤其是反对榨取主义,而只有建立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让生产者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才能真正解决当前的全球危机。

本杰明·塞尔温和查里斯·戴维斯(Benjamin Selwyn & Charis Davis)探讨了企业素食主义(corporate veganism)的兴起及其对环境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素食主义”概念。^[39]塞尔温和戴维斯指出,许多转向植物基食品市场的公司实际上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这些公司通过收购植物基食品品牌来提升其环保形象和扩大市场份额,同时继续从事大规模肉类生产等对环境有害的活动。塞尔温和戴维斯认为,这种企业素食主义策略加剧了动物苦难、人类剥削和环境破坏,无法真正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塞尔温和戴维斯提出了社会主义素食主义的概念,主张通过控制“生产的起点”(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和产品的分配方式来实现食品生产的转型。社会主义素食主义的核心在于通过工人、社区和消费者的民主控制来实现食品生产的民主化,减少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塞尔温和戴维斯进一步讨论了社会主义素食主义的具体实践方法,包括使用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为工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等等。塞尔温和戴维斯指出,社会主义素食主义不仅是饮食的变革,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彻底挑战,为全球气候危机与粮食短缺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约翰·巴克达尔和保罗·哈里斯(John Barkdull & Paul G. Harris)认为,资本主义对增长和利润的追求与生态可持续性存在根本矛盾,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减缓政策”与“适应政策”难以奏效,只有以民主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推动社会经济彻底转型,才能应对气候危机。^[40]巴克达尔和哈里斯指出,尽管国际社会长期致力于减缓气候变化,但收效甚微,温室气体排放依然持续攀升。气候危机应对失效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及其增长至上逻辑;资本主义通过“剥夺性积累”和生态不平等交换攫取利润,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已接近极限,气候危机将会加剧阶级矛盾,可能引发社会崩溃。巴克

达尔和哈里斯指出,主流政策框架仅强调技术调整和能源转型,却回避对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挑战,导致减缓与适应政策双双失效;当前制定的减缓目标因地缘竞争、技术依赖及企业利益阻挠而难以实现,适应政策也因资本主义的短视而受到极大制约,一些措施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能源消耗,贫穷国家因资金匮乏而无法实施有效的适应政策。巴克达尔和哈里斯认为,真正的转型需要以民主生态社会主义为核心,通过长期规划和资源公平分配避免资本主义的短视与剥削,其内容涵盖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承诺、满足基本社会需求的经济导向、高度的社会平等以及代表性和参与式民主。

卡洛斯·马丁内斯(Carlos Martinez)考察了中国在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平衡方面做出的努力,特别是中国的“生态文明”战略及其全球影响。^[41] 马丁内斯认为,中国虽然在推动工业化和扶贫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不过近年来,中国通过减少煤炭使用、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发展绿色交通和推进城市森林建设等措施,积极应对环境挑战,中国的这些努力不仅改善了国内环境状况,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马丁内斯对西方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肆意夸大中国责任并无端指责中国的行径进行了批判。马丁内斯指出,虽然中国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处于高位,但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仅为美国的一半左右。此外,中国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为发达国家生产商品和服务,而发达国家通过将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逃避自己的环境责任。马丁内斯认为,西方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肆意夸大中国责任并无端指责中国是出于政治目的,旨在转移公众对其自身环境政策失败的注意力,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国家分享绿色技术和经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国的这些努力不仅有助于改善全球环境状况,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八、帝国主义理论研究

大卫·坎普曼(David Kampmann)探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理论演变及其对全球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42] 坎普曼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用全球资本主义取代了帝国主义概念,这种理论上的转变导致他们对全球南方现有的社会主义实践项目持否定态度。坎普曼并认为,帝国主义通过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维持对全球南方的经济剥削和政治控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支持者的角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立场实际上支持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削弱了全球南方的社会主义力量,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平等。坎普曼呼吁重新审视帝国主义概念,支持全球南方的社会主义项目,以实现真正的国际工人阶级团结和全球公平正义。

一些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的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持否定态度,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的根源和影响。^[43] 福斯特指出,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否定源于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中心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相对削弱,以及全球南方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的崛起。福斯特指出,列宁不仅关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横向冲突,还强调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剥削,而依附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价值链分析等后续理论发展则进一步深化了对帝国主义的理解,这些理论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剥削行为及南方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提供了解释。福斯特对部分西方左翼学者将中国污蔑为帝国主义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这些指控缺乏事实依据,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外交政策与帝国主义有着本质区别。福斯特指出,西方左翼之所以否定帝国主义理论,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欧洲中心论偏见、资本意识形态霸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认为否定帝国主义理论不仅违背了历史事实,也削弱了左翼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力量。福斯特强调,正确认识帝国主义理论对于理解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至关重要,左翼应站在反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支持全球南方的革命运动,反对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共同推动人类社

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德博拉·马查多·努内斯(Débora Machado Nunes)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在分析金融化资本主义动态、全球化工人阶级的崛起以及指导外围国家的变革性实践方面的理论贡献。^[44]努内斯首先对依附理论中的“韦伯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作了区分。韦伯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认为依附是外围国家发展的条件之一,主张通过吸引外国投资和跨国公司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马克思主义传统则认为依附是外围国家发展的一个结构性障碍,外围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其经济发展受到核心国家的控制和剥削,同时外围国家存在独特的超级剥削现象。努内斯认为,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其核心特征仍然与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中的描述一致,如垄断、金融资本的主导地位、国际资本流动和世界阵营划分等。努内斯主张将依附理论与帝国主义理论相结合,认为依附理论可以为理解当代帝国主义提供重要的理论框架;将二者结合起来可以更加深入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动态,特别是金融化资本主义如何影响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这种综合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论发展,还可以为外围国家的变革实践提供指导,帮助它们更好地应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挑战。

威廉·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批判了当前左翼对帝国主义的简单化理解,认为需要重新思考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概念。^[45]罗宾逊反对将帝国主义解释为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压迫,认为帝国主义是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剥削和积累过程。罗宾逊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演变,特别是跨国资本的崛起及其对全球劳动的剥削,强调了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罗宾逊认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家也参与了全球剥削,因此帝国主义并非仅是西方的现象。罗宾逊批评传统左翼将“反帝”与“反美”直接等同的做法,认为其忽视了非西方国家的资本所具有的剥削性。罗宾逊主张采取一种跨国的阶级视角,反对将帝国主义简化为国家间的冲突,主张关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全球阶级关系。罗宾逊强调,社会主义者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无论其发生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同时应全力支持全球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以实现真正的国际主义。

罗宾逊的观点引发了许多争议。比如,大卫·莱伯曼(David Laibman)指出,罗宾逊的理论低估了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阶段性演变中的持续作用,即民族国家是推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积累的核心工具,而当前跨国资本主义的扩张仍依赖既有国家体系的政治、军事和金融资源,未能真正脱离帝国主义逻辑。^[46]此外,莱伯曼批评罗宾逊一方面过度强调跨国资本的全球同质性,另一方面完全否定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的支配关系。许准(Zhun Xu)认为,罗宾逊未正确把握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特征,低估了美国霸权在维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作用。^[47]许准指出,帝国主义仍然是当前全球等级体系的核心特征,美国及其盟友仍通过军事、经济与意识形态霸权主导世界秩序,跨国资本的扩张并未脱离传统帝国主义国家机器的支撑。许准指出,当前的社会主义斗争迫切需要凝聚共识,将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反抗美国霸权)作为一切斗争的核心。

在另一篇论文中,罗宾逊回应了学界对其帝国主义理论的批评。^[48]批评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罗宾逊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一是理论层面,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干预主义与跨国资本积累之间的联系;二是政治层面,即在美国霸权衰落、其他国家崛起以及地缘政治对抗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当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与民众掀起反抗跨国资本主义剥削的阶级斗争浪潮时,社会主义者应采取何种立场。在理论层面,罗宾逊指出,一些批评者要么将经济与政治彻底割裂,要么将二者完全混淆,这些批评者也未能把握美国干预主义与跨国资本积累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政治层面,罗宾逊指出,这些批评者对于社会主义者在全球阶级斗争中的立场存在分歧,罗宾逊批评了那些将反帝国主义简化为支持某个国家对

抗美国的行为,强调真正的反帝国主义应关注全球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的团结。罗宾逊在回应中重申了其跨国阶级分析视角,批评了将帝国主义简单化为国家间冲突的观点,主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理解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内涵。他呼吁社会主义者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支持全球范围内的工人阶级斗争,以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

九、结 语

2024 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在理论层面和现实问题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不仅对经典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还积极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在现实问题研究方面,他们紧密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金融化、生态危机、长期停滞、国际冲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和建议。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然而,对于个别学者的观点,我们既要看到其合理之处,也要警惕其中可能存在的偏差或局限。比如,长谷清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在生产中创造,而是在交换中形成的,货币的价值是由其自身的职能赋予的,这种观点显然背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货币理论。又如,威廉·罗宾逊对帝国主义的概念进行了扩展,不再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而是从跨国资本的角度界定帝国主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甚至也被其归为帝国主义。这种解读显然偏离了列宁对于帝国主义的经典定义。

与以往相比,2024 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仍然保持了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但在研究主题方面有所变化。在去年的研究报告中,我们总结了近年来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持续关注两个主题——金融化和数字经济或数字资本主义。^[49]从研究主题来看,金融化仍然是国外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但数字经济或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热度明显下降。同时,国外学者围绕价值理论、剥削理论、货币理论等基础理论的研究明显增多。这表明国外学者面对当代资本主义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现实问题,更加重视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从中汲取理论养分,用以构建更为完备和精准的分析框架。对于数字经济,国外学者逐渐认识到不应过分夸大其所具有的变革性和解放潜能,因为在资本主导的社会中,数字技术必然成为资本进一步控制与压榨劳动者的工具。鉴于此,国外学者直接以数字经济为主题的研究有所减少,转而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探讨了数字技术、平台经济等创新对劳动剥削、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等方面产生的具体影响。在去年的研究报告中,我们总结了近年来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两条主线:资本积累与劳动剥削。这两条主线不仅贯穿于往年的研究脉络,同样也是 2024 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线。基于对当前研究趋势的观察与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资本积累与劳动剥削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议题,将继续成为未来研究的主线。

参考文献

- [1] Giannis Ninos. A Method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ircuits of Capital[J]. Capital & Class, 2024, 48(1): 75-93.
- [2] Raju J. Das. On Marx's Theory of Fettering of Productive Forces by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J]. Critique, 2024, 52(4): 393-415.
- [3] Mark Cowling. Strategies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Work: The Case for Discontinuity [J]. Capital & Class, 2024, 48(1): 95-117.
- [4] Deepankar Basu, Cameron Haas, Thanos Moraitis. Intensification of Labor and the Rate and Form of Exploitation[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24, 56(1): 26-50.
- [5] Ingrid Hanon. The Autonomist Thesis of the Crisis of Value: Critiques and Perspectives[J].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 2024, 14(4): 550 – 572.
- [6] Kiyoshi Nagatani. The Value Form and the Fetishism of the Commodity[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24, 56(1): 116 – 131.
- [7] Clair Quentin. Unproductive Labor and the Smile Curve[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24, 56(2): 247 – 266.
- [8] Luis Arboledas –Lérida. A Marxist Analysis of the Metrification of Academic Labor: Research Impact Metrics and Socially Necessary Labor Time[J]. *Science & Society*, 2024, 88(4): 573 – 600.
- [9] Klemen Knez. Uneven Development, Choice of Technique, and Generalized Worldwide Law of Value[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24, 56(3): 405 – 426.
- [10] Tony Burns. Marx’s Capital and the Concept of Super-Exploitation[J]. *Capital & Class*, 2024, 48(3): 335 – 355.
- [11] Gonzalo Durán, Michael Stanton. Reductions in the Working Week: Labour Intensity and Productivity in Chile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24, 14(2): 271 – 290.
- [12] Nick Burns. Student Debt in American Society[J]. *New Left Review*, 2024, 145: 65 – 83.
- [13] David A. Spencer. Marx, Keynes and the Future of Working Time[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4, 48(1): 25 – 40.
- [14] Marko Lah, Andrej Sušjan. A Heterodox Approach to Masstige: Brand Fetishism, Corporate Pricing, and Rules of Consumer Choice[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24, 56(2): 214 – 232.
- [15] Sigurd M Nordli Oppegaard. Platformization as Subsumption? A Case Study of Taxi Platforms in Oslo, Norway[J]. *Capital & Class*, 2024, 48(3): 419 – 437.
- [16] Luis Arboledas –Lérida. The “Unpaid Labour” of Peer Reviewer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n the Industry of Academic Publishing[J]. *Critique*, 2024, 52(2 – 3): 317 – 338.
- [17] Alper Duman, Ahmet Tonak. Clar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ategory Profit on Alienation[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24, 56(2): 233 – 246.
- [18] Carlos Alberto Duque Garcia. Compet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fit Rates in Colombia: A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24, 14(4): 631 – 649.
- [19] Carlos A. Ibarra. Profit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Mexican Economy[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4, 48(3): 525 – 547.
- [20] Cihan Cinemre. Fiscal Expropriation in Turkey under the Rule of Erdoğan[J]. *Capital & Class*, 2024, 48(3): 439 – 461.
- [21] Emiliano Brancaccio, Fabiana De Cristofaro. In Praise of “General Laws” of Capitalism: Notes from a Debate with Daron Acemoglu[J].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4, 36(1): 289 – 303.
- [22] Michael Gaul. A Discussion of Marx’s Account of Technical Progress by Means of Wage Curves and Their Historical Evolution[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24, 56(2): 267 – 299.
- [23] Julio Hua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gital Technology[J]. *Science & Society*, 2024, 88(2): 212 – 249.
- [24] Paul Burkett. Eleven Theses on Music[J]. *Monthly Review*, 2024, 75(10): 56 – 61.
- [25] Marnie Holborow. Engels for Our Times: Gender,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Revolution[J]. *Monthly Review*, 2024, 75(10): 1 – 19.
- [26] Aleksandra Piletić. Continuity or Change? Platforms and the Hybridization of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 Context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24, 31(2): 438 – 462.
- [27] Gergely Csányi. Rethinking Social Reproduction Analysis and Indirectly Productive Labour Focusing on Value, the Body and Intimacy[J]. *Capital & Class*, 2024, 48(3): 399 – 418.
- [28] Jasmine Chorley –Schulz. Working –Class Soldiers,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State[J]. *Science & Society*, 2024, 88(2): 272 – 318.
- [29] Bruno Höfig, Leonardo Paes Müller, Iderley Colombini. The Tendency of the Non – Bank Financial Sector to Rise: A Material-

- ist Account of the Growth of Market – Based Finance[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24, 56(3): 355 – 379.
- [30] Bill Dunn. Problems of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Money, and the State Form[J].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24, 14(4): 573 – 590.
- [31] Miguel Rivera, Benjamín Lujano, Josué García, Oscar Araujo. The Power Bloc of Finance Capital and the Debacle of the Central Bank: Toward the Final Crisis[J].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24, 14(4): 591 – 615.
- [32] Pedro Romero Marques, Fernando Rugitsky. Rentiers and Distributive Conflict in Brazil (2000 – 2019)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4, 48(2): 275 – 302.
- [33] Jalal Qanas, Malcolm Sawyer. Financialisation in the Gulf States[J].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4, 36(3): 1174 – 1191.
- [34] Andrew G. Haldane, Alessandro Migliavacca, Vera Palea. Is Accounting a Matter for Bookkeepers Only? The Effects of IFRS Adoption on the Financialisation of Economy[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4, 48(3): 489 – 511.
- [35] Pelin Akçagün –Narin, Adem Yavuz Elveren. Financialization and Militarizati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24, 56(1): 70 – 100.
- [36]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Dialectics of Ecology: An Introduction[J]. Monthly Review, 2024, 75(8): 1 – 26.
- [37] John Bellamy Foster, Arman Spéth. Ecosocialism and Degrowth[J]. Monthly Review, 2024, 76(2): 1 – 8.
- [38] John Bellamy Foster. Extractivism in the Anthropocene[J]. Monthly Review, 2024, 75(11): 1 – 12.
- [39] Benjamin Selwyn, Charis Davis. The Case for Socialist Veganism: A Political – Economic Approach[J]. Monthly Review, 2024, 75(9): 36 – 51.
- [40] John Barkdull, Paul G. Harris.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From Capitalism to Democratic Eco – Socialism[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024, 35(3): 11 – 29.
- [41] Carlos Martinez. China’s Transition to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trategies and Global Implications[J].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24, 14(2): 176 – 199.
- [42] David Kampmann. Venture Capital, the Fetis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aking Intangible Assets[J]. Economy and Society, 2024, 53(1): 39 – 66.
- [43]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New Denial of Imperialism on the Left[J]. Monthly Review, 2024, 76(6): 1 – 32.
- [44] Débora Machado Nunes. Imperialism in the Financial Capital Era: Forgotten Contributions from Marxist Dependency Theory[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24, 56(1): 5 – 22.
- [45] William I. Robinson. Imperialism, Anti – Imperialism, and Transnational Class Exploitation[J]. Science & Society, 2024, 88(3): 319 – 329.
- [46] David Laibman.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Theory: An Assessment[J]. Science & Society, 2024, 88(3): 352 – 357.
- [47] Zhun Xu. Imperialism and Anti –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J]. Science & Society, 2024, 88(3): 357 – 361.
- [48] William I. Robinson. On Imperialism: Reply to the S&S Symposium[J]. Science & Society, 2024, 88(3): 362 – 367.
- [49] 李连波, 刘洺赫. 国外政治经济学最新研究述论(2023)[J]. 当代经济研究, 2024(8): 69 – 84.

责任编辑: 景玉琴